

热 风

主编 王晓明

讲义与读本

巨大灵魂的战栗

毛尖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热风

主编 王晓明

讲义与读本

巨大灵魂的战栗

毛尖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大灵魂的战栗/毛尖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4

(热风·讲义与读本)

ISBN 978-7-5458-0714-1

I. ①巨… II. ①毛…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4681 号

责任编辑 薛羽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巨大灵魂的战栗

毛尖编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5 16 开
印张 16.25
字数 220 千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714-1/I.232
定价 28.00 元

最好的时光(代序)

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们这群人一直一起做事,或者说,即使不一起做事,也习惯了彼此见面。

见面常常也没有特别要紧的话说,不过有罗岗、文尖在,总是热闹。罗岗说一句,文尖接一句,五十年夫妻做下来,也没他们那么知根知底。文尖大中午在大渡河路摔一跤,第一个电话打给罗岗,罗岗背心拖鞋赶到,哈哧哈哧把文尖背回家。我们这群人的关系,就类似,一摔跤,第一时间彼此通报。

外面世界沧海桑田,薛毅有时候咪口小酒说,要是我们把这些年吃喝喝务空务虚的时间用来买房炒房,现在也是有钱人了。没买房炒房,王老师还做房地产研究。这个,我们都觉得是扬短避长的活,酒酣耳热,也跟王老师争得大浪滔天。不过,穿过声名狼藉的城市回到家,扪心自问,也觉得,今天做文化研究,是良心。

这样就有了文化研究联合课程。两周一次,星期六下午和晚上。下午上文化研究理论课,晚上是经典作品选读。老师没工分,学生没学分,这不是80年代我们求学那阵,为了一个讲座去坐三小时的公车。互联网时代,学习可以足不出户解决。再加上,现代大学被迁得东东西西,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五六个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四面八方跑到华东师大听课,简直有点仗义,有些壮举,用毛主席《纪念白求恩》的句式,就是一个闵行学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山北路,听《百年孤独》,听川端康成,这是什么精神?

沮丧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疑问,这算什么精神?课程开张之初,文尖摔坏脚还没完全好,拄了拐杖来上《表征》,如此半个学期。饭桌上我们笑他“身残志坚”,他骂一声妈的,说以后不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不过,第二学期第三学期,第四第五第六学期,他一直在上我们这看

上去不是很有前程的联合课程。

有一次是下雨天，学生来得少，再加上因为教室没有办法固定，文科大楼上上，理科大楼上上，传媒系上上，外汉系上上，老师和学生都有了点凄惶感，课程结束的时候，大家飞快鸟兽散，炼红和我在光复西路上等车，不仅等不到一辆车，还被不断开过的车溅得一身泥，那一刻，我想起奥登的《美术馆》，既理解了这首诗为什么残酷，也理解了这首诗为什么又很温暖。

所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文化研究联合课程里开一门看上去如此传统的经典作品选读，我会说，这是因为，当我们批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守住自己的体温。而经典，对于我们这群在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是建立体温的一个途径，一种传统。比如，我们中间，倪伟温度比较低，但是讲到《局外人》，讲到默而索那“动人的冷漠”，他和妈妈的关系，和玛丽的关系，和塞莱斯特和萨拉玛诺的关系，他自己似乎也“向这个世界的冷漠敞开心扉”了。

经典选读至今已有二十讲，这一辑《巨大灵魂的战栗》里是十讲。你会发现，就像王老师上课和罗岗不一样，十篇讲稿也风格各异。王老师的两讲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现场感，段落之间还标注了同学发言，这是王老师成为王老师的原因吧，因为我们其他人都对讲稿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如何用最明了的话说清楚最复杂的意思，如何用文化研究的方式来讲经典作品，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很多。不过，要说王老师的课讲得最好，薛毅咳嗽了。

好吧，现在颁最佳影片，薛毅的《战争与和平》名至实归。薛老师的个人魅力当然是因素，但是为了这三小时的课，薛毅备了整整一个暑假的课，却是最朴素的方法论。他从娜塔莎、尼古拉、索尼娅、保里斯一口气讲到杰尼索夫、安德烈、拿破仑、皮埃尔、库图佐夫，罗斯托夫，再加上申格拉本、奥斯特里茨、波罗迪诺这些战役，再加上托尔斯泰其他小说的人物，加上托尔斯泰同时代作家笔下的人物，再加上托尔斯泰评论界的大腕人物，薛老师气贯长虹天涯比邻讲下来，既飞花摘叶手，又降龙十八掌，气场之饱满，理科大楼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兼

修的能力，薛毅的这节课是一个例子。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文献意识，如果当时能拍成DV，或许还能送去参加纪录片节。

不过，这本书，就是我们自己的纪录片，说是青春烬余录也可以，说是最好的时光也可以。我们这拨人，像启立文尖，从大学时代就跟着王老师读书，都是王老师的学生，一直以来，我们自己也格外依恋这种学生身份。但事实上，一个世纪已经转身，我们也快成为中年人。很多责任砸过来，很多义务涌过来，如何在一个特别容易变成虚无或者犬儒的时代，继续践诺自己当年踏上大学讲堂的理想，这是个问题。因此，重新拿起这些经典，对于我们自己，也是再出发。有一次，我从金沙江路回家，马路对面看到罗岗，他神情严肃，几乎有些严酷，哗啦啦二十年青春岁月流过，我突然意识到大家都曾经沧桑了。可是，每一次，坐在教室里，听罗岗讲小说，讲电影，讲理论，看他娃娃脸没变，大嗓门没变，讲起阮玲玉，他依然眼神温柔，我就会想，像我们这些至今试图把最好的东西拿给学生的人，其实，也像唱戏的需要脸谱，只有厕身伟大的文学传统，才能把最好的自己召唤出来，把最好的自己呈现出来。而且，也是在文学课堂里，我们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岁月不老，江湖有情。

我不完全了解每个学生的感受，但炼红和我，罗岗和文尖，都很珍惜地听了几乎所有的课。我喜欢看晓忠把平时的幽默收起来，特别郑重地问大家，嘉莉妹妹受“美德”引诱，有错吗？也喜欢小董用特别庄重的语调讲到卡夫卡生命中的一桩花絮。常常，上课开始的时候是一天中阳光最灿烂的时辰，课程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黄昏的太阳投进教室，给每一个人勾一个轮廓，大家围坐在一起，听王老师讲契诃夫的《草原》，莫名其妙，我感觉特别幸福。是的，这就是我想象的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我理解的大学意义青春形状。而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最低也最高的纲领：希望这文学课堂成为生活的意志，成为修正生活的意志。

毛 尖

2011年5月

目 录

- 1 最好的时光(代序) 毛尖
- 1 《卡拉马佐夫兄弟》: 巨大灵魂的战栗 王晓明
- 23 城市外面有草原: 读契诃夫的《草原》 王晓明
- 51 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 薛毅
- 93 “朝向伪诈的幸福的大胆的道路”——维尔哈仑《城市》之“阅读” 倪文尖
- 113 单身女性: 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巨人 孙晓忠
- 134 温情的面纱撕破之后——《变形记》解读 董丽敏
- 152 向这个世界的冷漠敞开心扉——《局外人》解读 倪伟
- 193 “电影”感受“政治”的瞬间: 左翼思潮与上海电影文化——以《神女》为例 罗岗
- 218 《大路》变窄: 费里尼和新现实 毛尖
- 231 例外: 关于小津安二郎 毛尖

《卡拉马佐夫兄弟》：巨大灵魂的战栗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题 外 的 话

今天讲《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小说,1880年写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大约五十年,就被欧美主流文学界认定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卡拉马佐夫兄弟》也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因此,这本小说在全世界有无数的评论,看都看不过来的。

我先提一个问题:今天在座的,完整地读过这部小说的有多少,能不能举一下手?……啊,不到四分之一啊!其他同学是从来没有读过的,还是读过部分的?……大部分都读过啊。我再问一个问题,在最近两个礼拜里重读或新读这部小说的人有多少,哪怕只是读了一部分?……不到十个人?

在这个文化研究的课程——而不是外文系的或中文系的课程——上,我们怎么来读这个小说?这里我要稍微讲一点题外的话。我们这个文化研究的联合课程,在这个学期里是开两门课,一门是今天下午那样的理论课,一门是现在这样的作品解读课。这个解读课现在是讲文学作品,以后还会加上电影作品。这两门课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理论课,说得简单点,就是训练我们的脑子,通过读一些好的理论书,来培养我们想问题、理解生活和现实的能力,训练批判性地理解现实的思想视野和思维方式。有了这样的能力,我们就不那么容易被“忽悠”。

但是,只有这样一种思维能力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鲁迅当年对

这个事情就有过反省，他很后悔做了那么多思想启蒙的工作，说你把人的脑子弄好了，但是这些人依然没有出路，头脑清醒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现在徒然增加人的痛苦。他有一个很辛辣的比喻，叫“醉虾”，说正因为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活虾，统治阶级和社会黑暗吃起来就更有快感。但是鲁迅当年只反思了这个问题的一面，他没想到今天还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经过这样的思维的训练，人有能力看清楚现实，却反而更自觉地融入这个现实，跟它打成一片。这个融入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我们学了批判理论，看清楚这个现实是那么厉害，似乎没办法改变，那算了，我还是和它混在一起吧。就像下午薛毅老师分析的那样，尽管心中还是有不满，但也只是通过某种慢节奏的休闲生活，或者通过皈依宗教，来求取心灵的平衡，心灵平衡了，也就安心于向现实投降了。还有一种是，学了这些理论，于是激烈地批判现实，但这同样是一种心灵平衡术，因为他只是理论上的批判，在文章和课堂上批判，他自己的实际的生活，他对个人未来的规划，依然是照着现实的轨道在滚动，甚至滚动得很成功，也就是说，头脑和身体脱节。文化研究在今天的欧美和日本，很多情况就是这样，在思想理论上非常激进，社会实践上却非常软弱，而且整个学科越来越和社会体制结合在一起。我认识一个做文化研究的学者，这个人有意思，他非常愤激地说，整个日本的文化研究是腐烂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日本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了现代或后现代文化生产的一部分，虽然看起来是有激烈的批判，骨子里却已经被社会体制的大机器收编了。

今天的社会现实是很严峻的，这严峻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形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愚民的专制”——这是借用鲁迅的话。这个专制不单是要把人训练为容易被“忽悠”的愚昧者，更在大量地生产心胸狭隘、眼光如豆、公然视高尚为虚幻的——还是借用鲁迅的话——“无特操者”！他没有“有些事我是绝对不能做的”这样的底线，也没有对理想、对美好和崇高之物的不可磨灭的热诚。也就是说，今天的问题不单是我们的脑子被搞傻了，套用一个容易受批判的词来讲，更是“心灵”被搞坏了。愚

昧不可怕,这可以通过教育啊、思想启蒙啊等等来改变。可如果一个社会上有大量的“无特操者”,那就坏了,因为这些人是很清醒的,就像刚才说的那两种情况,他们简直可以说是主动选择了接受现实、与它合流的生活态度的。要把这些人救过来,那是需要太多的别的社会条件了。

正是这样的现实,对文化研究的教学提出了和以往不同的要求,你不能只是讲理论,讲思想方法,你还要能够触动人心,要能影响心灵。归根到底,我们之所以要练脑子,是因为这是“人”的脑子,“人”才需要这样的理论、需要这样的思维能力,如果心灵都被搞坏了,“人”没有了,理论学得再多、思维方法再精妙,有什么用?

正是出于对这样的现实要求的理解,我们确定了在理论课之外,另外开一门文学和电影作品课。也是因为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来解读作品,这门课的侧重点,就不是在理论的具体的应用,不是培养或主要不是培养那种对作品的尖锐明快的政治经济学式的分析。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对巴尔扎克有非常出色的分析,毛泽东对《红楼梦》对《水浒传》有非常犀利的分析。一般人们说到《红楼梦》,眼光都是放在大观园里、放在宝黛爱情上面,可毛泽东不,他单拎出一个第五十三回,说这才是全书最有意思的部分,那个乡下农庄送进宁国府的货物的清单,暴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盘剥:这的确是别出心裁的读法。他说《水浒传》的要害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也是别出心裁的批评,背后很清楚地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式的视野,甚至就是一个现实政治的暗示。但我们的这门课,侧重点不在这方面,用马克思的例子来讲,我们侧重的不是他对巴尔扎克的那种政治经济学式的评论,而是他对希腊悲剧的那种评论,那种从文学角度展开的评论,或者说,我们希望在这课堂上更多地做一种广义的文学的读解和评论。

但这样一说,问题又来了:什么是文学?无数定义。在中国,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大家都倾向于以一种比较狭隘的方式,重新定义文学和文学的特性,文学是什么?就是以语言文字为形式的审美活动,在诗歌方面,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诗到语言为止”。在今天的中国的

大学里面,这种对文学的定义,已经是一个主流的定义了。今天没时间来讨论为什么那时候大家要从审美和语言形式的角度来定义文学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有它历史的正当性,也有非常大的后遗症,这些我们今天不讨论。从1990年代晚期开始,另一种对文学的定义也出现了,大家看看广告,比如我最近比较熟悉的房地产广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文化工业和创意产业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诗意。它们的定义正在广泛地流传,而且和前一种定义有某种合流的趋势。这种合流对现存的文学理论形成了非常大的挑战,但这个我们今天也不讨论。

我在这里只说一点:文学,或者文学性,是一个比语言、比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审美范围都要广泛得多的东西,也是一个不能被各种历史化或者语境化的方式完全消解的东西。最近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主要是来自欧美的各种各样的批判理论,教给我们一个批判的方法,就是把所有重要的概念,特别是今天流行的概念,还原到它生成的社会环境里面去,看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产生的。通过这样一种语境还原的方式,很多被看成是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价值的概念,包括审美这个概念,都被非常清楚地揭示出了它们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条件的血肉关系,没有这些关系,就不会有这个概念。也许今天的很多人觉得,对“文学性”这个东西也可以如此处理,离开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就没有“文学性”这一样东西。但我要强调的是,文学或文学性,是不能完全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它当然有许多方面,是从属于各种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但也有一些方面,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方面,能够超越特定的社会环境,而形成一种历史的延续,一种普遍的意义。这个仔细讨论起来话可以说很多,我这里只粗略地说一点:几百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当人类社会的黑暗和光明持续斗争的时候,文学站在黑暗一边的情况是很少很少的,不是说没有,但很少,在大多数时候,文学都是站在受欺负的弱势者一面的,站在追求正义和公正的社会未来这一边的。譬如对中世纪的宗教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抗议,文学

都是最早的参与者。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很大一部分正是起源于文学研究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到目前为止，文学是使人类变得更像人的最重要的生活形式之一。它是一种生活形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字形式。所以，文学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通过阅读和思考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进入一种精神的过程，不断地去体会、去理解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性，不断用新的认识去补充、质疑乃至推翻已有的定义，发展新的定义。这样的过程，实际也就是一个不断地去愚民化的过程，一个持续发展对现实功利以外的其他价值的认同的过程，一个在精神上不断地“人”化的过程。

具体到这门课，我的理解是，要尽可能深地进入不同的作品，努力用我们觉得合适的各种文学的方式去阅读。这个阅读的过程，理解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体会和理解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性的过程。我觉得这是比掌握某一种思想方法、某一种理论更重要、也更困难的事情。这是一个所有的人都需要认真参与的事情，因此，这门课应该尽可能多地成为一门讨论课。

题外话到此结束。

怎么读这部小说？从哪一个入口开始？

那么，我们怎么进入《卡拉马佐夫兄弟》？怎么来读这部小说？总得找一个入口，我现在想拿两个作家的话来描述这个入口。一个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讲，她在其中比较俄罗斯文学跟她所熟悉的西欧文学，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概意思是说，俄罗斯文学有巨大的灵魂，她觉得在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里，看不到像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那样的巨大的灵魂。这话我觉得有道理。现在我们看英国小说，我想大家会有一个感觉，除了狄更斯以外，很难说英国小说家的作品里有规模巨大的灵魂。歌德的

《浮士德》所以了不起，也就是因为它里面呈现的灵魂的容量很大。但是，尽管德国有歌德，英国有狄更斯，像 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所呈现的那样巨大的灵魂，一般欧洲文学中还是很少见。当然，伍尔夫这样概括的时候，也包括了一些别的俄罗斯作家，但她主要指的是托尔斯泰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一位作家是尼采，他是一个狂人，谁都不放在眼里，可他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让他从作品中学到最多的心理分析的作家。伍尔夫和尼采，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却都说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作家在他的作品里面展示了巨大的灵魂。

我个人阅读这部作品的印象，正可以支持这两位的话。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其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作品都差不多，人物都是话篓子，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不断地说。好像是法国作家纪德有这么一个说法：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托尔斯泰是非常精细地描写笔下的人物，因此读者是通过眼睛看，来进入他的小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呢，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说，滔滔不绝地说，所以读者是用耳朵听着进入他的小说世界的。的确，这部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或别人的精神和心理问题。而且这种谈话不断地往返进行，在不同的层面上，从最抽象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到最感性的问题：我到底爱谁，爱哪一个女人，翻来覆去地纠缠不休。小说的篇幅这么长，人物说话又这么啰唆，很多同学没能读完这部小说，一个原因，大概就是因为这些人说话太长了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谈话汇拢到一起，却的确会形成一个强烈的感受：这部小说整个就是一个灵魂的展露，心灵的展露，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展露出来的灵魂充满了冲突。这冲突有时候发生在灵魂的不同层面之间，但更多的是发生在同一个层面之内，有时候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冲突，但更多的是同一个人自己内心的冲突。所以，伍尔夫所说的灵魂的“巨大”，并不仅仅是指灵魂的规模的巨大，也是指这灵魂常常处于十分剧烈的矛盾、和这矛盾引发的战栗与痉挛之中。恰恰是这个灵魂的痉挛、冲突、

战栗，这种不平静的状态，更深地呈现了这个灵魂的大。

更有意思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采用的是一个破案子的故事框架，故事好像是被“谁是罪犯”这个线索组织起来的。但是，尽管作家用案情来组织和推动整个叙述，叙述的重心却完全不放在谁是罪犯这个问题上。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会用破案子做故事框架，可能是和小说发表的方式有关。这部小说最初是在杂志上连载的。小说那么长，的确需要帮助读者在不同时间读到的内容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破案子的故事框架的主要功能，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因为作家采用了这样一个非常容易把笔墨、重心和注意力吸引到案情上面去的叙述框架，小说最后形成的面貌，就更明显地表明了作品真正的中心是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巨大的灵魂”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入口，从这个角度入手展开阅读，是一个可行的选择。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选几个细节，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这个小说所呈现的巨大的灵魂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它的内部是怎样矛盾和冲突的，人物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痉挛和战栗的。考虑到小说的篇幅和课堂时间，我想对讨论提出两个限制，第一，我们的问题集中在小说的前两部里面，后面的来不及讨论了；第二，我们的讨论先不要往高深处走，而是要进入作品，尽可能贴着作品讲。

我想我们一起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第二卷。第一卷等于是交代了人物背景，故事真正展开是在第二卷：卡拉马佐夫家内部发生了矛盾。于是他们来到当地一个很有名的修道院的长老的修道室，请长老出面来开一个家庭会议，调解他们家的矛盾，这有点像我们今天法院的庭外调解，或者居委会的调解会。有意思的是，整整一卷基本上都在写这些人怎么来到长老的修道室，怎样在这里发生了一场非常抽象的关于宗教问题的辩论。参加辩论的人有佐西玛长老、几个神父、先到的卡拉马佐夫家的老父亲、二儿子伊万、小儿子阿辽沙，还有他们家的几个亲戚，例如米乌索夫。在这些人争论的过程当中，大儿子德

米特里来了。他来了以后并没有提议马上开始家庭会议，而是也卷进了这个辩论。辩论完了以后，家庭会议才开始，但很快就以一番剧烈的争吵而告终。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部分的描写。

对俄国社会状况的大致介绍

为了便于讨论，我先介绍一下 19 世纪俄国的基本情况。现代俄国的历史并不长，它由莫斯科大公国这样一个在欧洲最东面、面积不大、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诸侯国发展起来，逐渐向欧洲和亚洲扩张，最后形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面积广大的国家。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前，俄国社会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封建社会。贵族构成社会上层，贵族的总代表是沙皇，贵族下面是农民，包括农奴、少量的自由民，和没有贵族头衔的地主。地主当中主体的部分——这个主体并不一定是指人数——同时就是贵族。这样的俄国地主通常有三个身份，地主、贵族和军官。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地主，有很大一个庄园，又是伯爵，年轻时候还是军官。《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老大德米特里，也是很典型的这样一个人，出身地主家庭，军官，但因为父亲没有贵族头衔，所以社会身份比较低。

但是俄国地主跟譬如西欧其他地方的又有点不一样。俄国农村还保留着公社制度，土地并不总是属于地主的，在很多情况下，土地是属于整个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这个土地分成很多块，分给农民种。而农民呢，要是一个礼拜劳作五天的话，三天为地主，两天为自己。农民是属于他被分到的那一小块土地的，他不能自由地跑来跑去，所以他们被称为农奴。农奴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和他对于公社土地的权属依附，同时并存。类似俄国这样的公社，在整个欧洲都有，比如希腊，但是在俄国数量最多。当然在地主、贵族和农奴之间，还有少量的自由农民，这个说起来很复杂，因为俄国各处情况不一样，农奴改革之前和之后更有很大不同。这里没时间详细介绍，只能笼统地说一说。

传统俄国社会的另外一个基础，就是东正教。基督教在全世界分成三大块，天主教、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新教，再就是东正教。俄国的基督教主要就是东正教，它的教义和西欧的天主教、新教有一些差异，比如特别看重圣母玛利亚，等等。东正教对俄罗斯人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为俄国的政治结构、土地制度等等提供了价值观念上的根据。

从17世纪晚期开始，彼得大帝改革，非常激烈，要把一个传统的俄国改变成现代化的俄国。这个改革从某些方面来讲进展非常快，比如贵族阶层，很快就形成一个模仿西欧宫廷文化的风尚，人人学讲法语，因为当时法国被认为是代表着最先进的现代文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当中有大量的法语单词。然后城市起来，商人阶层起来，资产阶级起来，现代知识分子逐渐形成。最早的知识分子都是从贵族当中产生的，最有名的就是“十二月党人”。随着现代教育在俄国的展开，很快又出现了平民知识分子，别林斯基就是其中的代表。彼得大帝改革引发了俄国上上下下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社会瓦解得非常快。这样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了巨大的反弹：对于俄国社会究竟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个是认为俄国应该坚定不移地沿着彼得大帝开创的方向加速度前进，脱胎换骨，进一步西欧化。这么看的人后来被称为西欧派，或者自由派，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现代化派。但另外一个声音说，不对，俄国不应该这样，俄国这样下去的话，就完蛋了，应该重新探讨俄国传统社会里面包含的非常宝贵的精神、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从中发现俄国的新方向。这么主张的人被称为斯拉夫派。西欧派和斯拉夫派，最初都是绰号，是骂人的话，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新左派。所以被叫做斯拉夫派的人最初都不喜欢斯拉夫派这个称呼，后来慢慢觉得这个称呼也不错，斯拉夫派就斯拉夫派吧，无所谓。斯拉夫派的影响很大，很多有名的人物都卷入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斯拉夫派作家。

斯拉夫派跟西欧派之间剧烈的思想冲突,其实是显示了俄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对知识分子的冲击,当一个社会天翻地覆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要对社会现实发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他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上帝是否存在?他自己明说,他的小说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这个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宗教问题,他说的上帝并非指那个神,而是指构成一个社会,从它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到每一个成员行事做人的基本准则的那一种东西。这么说吧,一个社会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总有某个根据。上帝其实就是俄国传统社会的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要问的是:这样的根据到底还存在吗?

背景介绍到这里为止。

在长老修道室里的辩论中,伊万的位置在哪里?

现在我们就来看发生在长老修道室里的这场辩论。论辩的一方是佐西玛长老和他的两个神父,尽管长老一开始没有完全上场,但他显然是这一方的领袖。另一方是老卡拉马佐夫的亲戚,米乌索夫。这个人物无论从身份和经历上,都是可以看成西欧派的,而三个神父则可以被看成是斯拉夫派。他们争论的题目是,在俄国,东正教教会应该成为怎样的团体?教会和现代国家的关系是什么?一方主张教会应当现代化,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今天在欧洲和俄国看到的情况一样,或者像中国的佛教这样,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部分。这是西欧派的观点。另一方认为不对,不应该是教会变成现代国家的一部分,而应该是国家逐步发展成为教会。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现代国家是一种社会状态,教会是另外一种社会状态,前者,也就是现代国家为标志的那样一种世俗社会,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此应该逐步地往后者转变,使现代国家变成一个教会式的社会。双方争论的一个例子是对罪犯的惩罚:现代社会对罪犯的惩罚,是把他开除出社会,剥夺公民权,剥夺他的自由;神父们则认为,用这样的方式是不可能消除犯罪的,应该改用教